

文匯时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乐见大学课程的系统变革

张涛甫

不能沦为“水课”泛滥的灾区

大学是知识的殿堂,大学课堂是传播知识、培育人才的高端平台,支撑大学课堂的则是一门门串联或并联起来的课程。每门课程向求知者开启一扇门,求知者怀着朝圣之心,由师者领入知识的园地,让知识的阳光洒满每一片青春的绿叶。这是我们理想中的求知境界。

但如今,很多时候,大学课堂沦为“水课”泛滥的灾区,而那些处在求知高峰期的大学生则成了知识的“灾民”或“难民”。天长日久,不仅污损了大学的声誉,也恶化了教与学的和诣:师者埋怨学生学行不在状态;学生责怪教师知识“掉链子”。学生甚至直接用脚投票,翘课、逃课;有时,学生即便“身在曹

营”,心也会“出轨”。君不见,课堂“低头族”业已成为大学课堂的一大景观。

如何让学生倦怠的眼神重新回到课堂,让学生出走的心回到师者的“三尺讲台”?若简单粗暴地用纪律“紧箍咒”约束,也许会有些疗效,但不是治本之策。必须从供给侧发力,对大学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更新和升级。关键是要对大学课程进行整体改革。

回归通识课程的本意和初衷

近日,复旦大学启动新一轮课程改革,集中清理一批不符合人才培养需求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其中包括一些因人设课或是质量不达标的课程。据说,这是国内高校首次集中清理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不符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我们应为这种自我革命式的课程改革

鼓掌。

这次复旦的课程“瘦身”从通识课程下手,这是一招妙棋:一是没有整体把整个课程体系掀个底朝天,翻江倒海、腾笼换鸟。这样做固然痛快、彻底,但存在系统风险;万一砸了,满盘皆输;二是通识课程往往是大学课程的重灾区。通识课对于大学教育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是专业课程的“扫盲版”或各专业藩篱之外的“公共草地”,而是提供各专业共享知识和价值的基础工程。事实上,很多大学的通识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识课,而是专业营养稀薄、没什么通识逻辑可言的知识拼盘,这种“水课”是由多个专业拼凑出来的公共垃圾。即便像北大、复旦这样通识课教育相对成熟的大学,也难免会有“公地”之痛。

复旦大学率先清理通识课中的“负资产”,是勇毅之举。壮士断腕,忍痛割肉,这需要极大的勇气。那些被割下的课程,若细加考量,也不一定全是垃圾。有时候,把有些被清理的课程“放生”到专业的池子里,也许算不上“水课”。这里涉及对通识课程逻辑的理解问题:通识课程提供的是各专业不可或缺席的共享知识或价值理念,为各个专业提供知识之“核”和价值“基因”。比如,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公共知识等方面的知识和理念,不应囿于专业门墙,而当成为穿越专业藩篱的共享知识和价值理念。为各专业提供知识之“核”和价值“基因”,应当成为通识课程设计的基础共识,若背离这一点,仅将通识课程视为专业课程“剩余价值”的延伸,或专业“自留地”之外的“公田”,也就背离了通

识课程的本意和初衷。

实现大学知识体系的大循环

解决了通识课程,问题最多解决了一小半,还有专业课程链子掉在地上。大学专业课程是传播专业知识的载体。专业课程的设立是一个系统工程。在通识课程之上,建立专业课程矩阵,藉此,批量的专业知识传输到学生那里,变现为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大学专业课程的设计和落实,受到专业逻辑和教育规律的规定,同时受到知识迭代的约束。如今“网”时代,原先基于传统知识时代的知识“点性”生产和“线性”传播,几乎被新媒体技术杠杆整体掀翻,致使专业课程的设计和贯彻难以在专业逻辑、教育规律、知识迭代节律三个点上均能踩得准,大学的专业阵脚变得慌乱起来。

面对外部环境的强劲冲击和实践的深刻巨变,大学的专业知识生产和传播短期内找不到专业,专业课程的调整跟不上社会需求的变化。为此,很多大学的专业课程采取的策略是“打补丁”,即在原先的课程版图上,因应外部变化和实践之需,新增一些课目和内容。这种局部维新的方式,并不能解决专业课程的系统性失调之困。要求得系统性、根本性的解决,需要打通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两大主动脉,实现大学知识体系的大循环。

当然,要解决大学知识体系的有序更新,仅靠局部突围显然无济于事,需要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发力。今年1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这也是首个高等教育质量质量的国家标准。这一“国标”,为全国高校5.6万个专业点确立量化标准。同时,开展专业三级认证体系建设试点。今后将对95%以上的专业启动基本质量标准认证,对80%以上的专业开展国家质量标准认证,对20%以上的专业进行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这些标准化的努力,有助于规范、促进大学教育的专业化,进而从宏观战略的高度,为中国大学的课程改革确立基准和方向。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破题“救命药”短缺系列报道①

全球抗肿瘤药物市场快速扩张,新药研发捷报频传,但大量中国病人无法及时用上国外“救命药”

抗癌新药进口上市何时不再“慢半拍”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见习记者 李晨琰

“国内外药物市场互通能给很多病患带来希望,肿瘤晚期病人是等不起的。”失去了母亲的王先生说。两年前,他的母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针对这类癌症的新药当时已在美国上市,但国内未上市,就在确诊两个月后,这位母亲便离世了。

肿瘤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抗肿瘤药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随着靶向药物、免疫制剂推出,全球抗肿瘤药物市场快速扩张,新药研发捷报频传。可现实是,面对国外的“救命药”,大量中国病人“望药兴叹”——国外上市的抗癌新药进入我国时间长,种类少,受益面十分有限。

如何让更多中国肿瘤患者及时用上“救命药”?记者走访三甲医院、药监卫生部门及医学、法律专家,探讨一种可能性:抗癌新药进口何时不再“慢半拍”?

“望药兴叹”

自1982年工作算起,上海胸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韩宝惠教授已与肿瘤打了36年交道,肺癌患者是他最常接触到的病人群体。

“在上海,每年约七八千人被确诊患上肺癌,全国每年约七八十万。”韩宝惠说,随着CT等影像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很多早期肺癌患者被筛出,并获得及时手术的机会,治愈了。而另一部分人没那么幸运,确诊时已是中晚期患者。

韩宝惠接诊过一个60岁的男患者,2014年确诊为肺癌晚期,当时服用第一代靶向药物治疗,两年后出现了耐药,2017年出现脑转移,他急需用上针对这个靶向药耐药情况的一款新药,但这个药尚未在国内上市。该患者最终托人去境外购药,吃上了药,活到今天,病情稳定。

“这名病人是幸运的。他是公司老板,能支付昂贵的药费,在境外也有亲友,有购药的稳定渠道。”韩宝惠注意到,经济实力强的患者到后期都会选择境外治疗。在仁济医院、瑞金医院等上海其他三甲医院,记者获得类似信息:去香港购药、看病的肿瘤患者很多。医生注意到,美国、欧盟等批准上市的新药,很快就能在我国香港买到,“香港医院还能协助病人将肿瘤样本送到美国做基因测试,以确定肿瘤特性进行个体化精准治疗”。

我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报告显示,在中国,平均每天有超过一万人被确诊为恶性肿

编者按

4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中国人为什么吃不上新药?”——曾经这是患者之痛、医生之急、行业之忧。如今,国家利好政策不断,这个长期困局正在往疏解的方向走。今起本报推出“破题‘救命药’短缺系列报道”。

►实施零关税后,进口抗癌药价格将大大降低。
图/东方IC

瘤患者,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380万例,死亡病例约229万例。癌症已成为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杀手”。

“一上市,已过时”

据英国《柳叶刀》统计的2010年至2014年全球各地区恶性肿瘤五年生存率数据,其中肺癌在中国五年生存率为19.8%,美国是21.2%。

“产生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国内的肿瘤晚期患者多些,国外的早期患者相对多些。”不过,仁济医院肿瘤科主任王理伟认为,抗癌新药的缺少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海外新药要在我国获批上市,有着一条漫漫长路。

2016年,70多岁的杨阿姨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建议她服用克唑替尼(一种靶向药物)。经过一年半的治疗,杨阿姨出现了耐药反应并伴随骨转移、脑转移。针对这种情况,阿雷替尼是最好的选择。然而,这个2015年在美国上市的药品还未引进国内,找不到代购渠道,不到两个月,杨阿姨离世。

“希望能少一些人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国内外药物市场的互通能给很多病患带来希望,因为恶性肿瘤晚期病人是等不起的。”

失去了母亲的王先生对记者说。

当今,国际上肿瘤的治疗研究进展迅速,新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不断出现,但由于境外上市药物进口在我国需要重新进行临床试验,在临床试验阶段及药品审评审批环节往往耗时较长,到真正进入国内临床使用,需要更长时间。有人说,海外“救命药”“救命药”在国内上市不止“慢半拍”,甚至“一上市,已过时”。

踏出国门为“搏命”

吃不上“救命药”,有没有其他生机?目前,患者可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新药上市前的临床试验和医生发起的医学研究,这通常都是免费用药。不过,通过这种方式获益的人群很有限。数据显示,在中国进行与恶性肿瘤相关的临床研究项目数量不到美国的1/5。因而也有患者戏言,想当试药“小白鼠”也不容易。

这成为海外就医的最大卖点。2017年的一份行业报告显示,近年来,每年约50万中国人去海外就医,寻求的医疗产品以癌症等重病治疗为主,占比超四成。

个别媒体、朋友圈传阅的个案加剧了患者对国外新上市抗癌药的渴望。记者从瑞金医院、仁济医院、肿瘤医院等医院的肿瘤医

生处获悉,在收治的经济条件较好的肿瘤患者里,超半数会询问:“海外有没有机会?”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去海外就医的。还有一些患者寻求从印度等地购药,朋友圈、网络上形成了“黑市购药”的地下链条。“很多患者没有渠道,只能上网搜集信息,买到假药的也不在少数。”王理伟感慨,肿瘤晚期患者根本耗不起,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他们都不愿放弃,“但药品代购水太深,很多患者到最后也只是寻求个心理安慰。”

另外,按我国药品监管相关规定,在国内未上市的新药都以“假药”论处。患者从境外自行购药并服用,自行承担用药风险;但也有一些肿瘤药需注射用药,于是就出现了医生冒着风险给患者用药的情况。

“我很清楚,这是国际治疗‘金标准’,药一用下去,人就好了。但我给患者用药,就是非法用药,可我又不能眼睁睁看着病人等死。”一名三甲医院的教授很苦恼。

这样的“非法用药”在三甲医院、民营医院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大家普遍采取全程“不开医嘱,不留痕迹”的做法。但医生清楚,这对医生、医院、患者,都风险很大。抗癌新药能否提速进口上市?在医生、医院、患者这三方看来,都到了“等不起的要命节点”。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外卖平台或推“双问责制”

上海今年底要基本消除无证无照食品经营企业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在上海,网络订餐日均订单量已超过100万,每天有大量外卖“小哥”走街串巷给人们送餐。网络订餐这种消费新业态在满足大众需求的同时,也引出食安新挑战。昨天,围绕加强网络平台订餐监管工作,上海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联合召开办理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专题座谈会。会上,有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对网络订餐平台及重要违规个人实行“双问责制”。

据悉,单在上海,近7万家持证或临时备案的公共餐饮单位,就有一半以上已加入网络订餐平台。目前,占市场份额绝大多数的饿了么、美团外卖、百度外卖三大平台共有本市入网餐饮单位约8万户次,部分连锁餐饮企业还自建订餐网站。

订餐平台快速扩张和订餐量激增也为监管带来了挑战。据监管部门梳理,主要有五大问题:平台对餐饮单位入网审查把关不

严,无证餐饮伪造、冒用其他商家许可证照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平台业务员因为业绩而为无证餐饮提供入网便利,突破法律底线;其次是平台对餐饮单位入网后管理不到位,对许可证过期、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缺乏监管;三是配送环节食安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包括配送人员健康、配送箱包清洁、配送过程冷链控制等存在安全隐患;四是超负荷外卖带来食安风险;五是外卖餐盒垃圾造成环境污染。

市人大代表许丽萍对网络订餐平台无证经营“黑作坊”高度关注,提出建立严重违法人员黑名单的建议。她谈到,可援引建筑设计界的做法:一旦有违法行为,对法人代表和重要违规人进行“双问责”。市政协委员、饿了么董事长张旭豪表示认同:“我们现在是层层管理。200个送餐员锁定一个销售人员;10个销售人员,锁定一个区域经理。每个管理节点上都要担负起责任,所以

我也很支持加强双问责制。”

加强网络订餐业态的监管,一直备受代表委员关注。昨天的会议上,市政协委员李国华、谢国群等对完善网络订餐监管建议国议。在他们看来,监管部门也要帮助企业夯实防范食安风险的能力,提升企业发挥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能力,这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

市食药监局局长杨劲松表示,针对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食药监部门也在积极落实。比如,建立平台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和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已有10人被纳入黑名单。在推进数据共享,实施精准监管方面,近期,上海食药监局会同公安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打击网络无证食品经营违法行为合作备忘录》,加强政企网络监管平台数据共享。

政企数据“打通”已有实效。据透露,利用入网餐饮单位大数据分析,有望甄别出开店极快、外卖超量等可能存在较高食品安全风

险的“网红”餐饮单位,以及消费者差评率最高的餐饮业态,将帮助监管部门开展更精准的监督检查。近期,上海食药监部门经大数据比对发现,日料店反映集中,200元以下的“低价日料”食品安全问题查实率很高。

针对外卖餐盒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部门回应称,市质监局已牵头指导行业协会和两家平台研究制定环保餐具团体标准,实现塑料垃圾减量;同时,也正引导平台推广环保餐具,实现外卖垃圾源头减量,并加强塑料餐具回收管理。

上海在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的同时,也不会放松对“线下”违法食品安全行为的监管。记者获悉,上海今年底要基本消除无证无照食品经营企业。截至4月16日,全市已治理无证无照食品经营8359户,尚存无证无照食品经营12688户。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威、副市长许昆林、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出席座谈会。

上海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将增加至2996元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透露,2018年度住房公积金按职工本人和单位各7%的缴存比例所对应的月缴存额上限为2996元,月缴存额下限为322元。补充住房公积金按职工本人和单位各5%的缴存比例所对应的月缴存额上限为2140元。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用人员、自由职业者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为5136元,月缴存额下限为322元。自2018年7月1日起开始调整。

根据《关于2018年度上海市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比例以及月缴存额上下限的通知》(简称《通知》),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由2016年月平均工资调整为2017年月平均工资。2018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申报时间从7月提前到4月起,各单位可从2018年4月4日起登录上海公积金网(www.shgjj.com)的基数调整专栏办理。

为落实2018年4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将阶段性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政策期限延长至2020年4月30日”的要求,以及住建部执行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的具体措施精神,2018年度职工本人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由各5%至7%,原则上缴存比例各为7%。企业可以根据沪公积金管委会〔2016〕10号文所列举的降低缴存比例的情形,选择各5%或各6%缴存比例,但应当通过集体协商,形成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专项协议,并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大会表决通过,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不再审批。《通知》强调,各缴存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市公积金中心对选择降低缴存比例的单位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苏浙沪皖共享国际技术转移渠道,为长三角企业在全球寻找「技术解决方案」

探索共建太平洋西岸科技协同创新区

本报讯 (记者沈秋莎) 迄今为止,上海已经在美国、德国、荷兰、以色列等国布局近30个国际技术转移渠道。今后,这将成为长三角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共享资源。这是记者从昨天上海市科委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暨首届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信息。

长三角是我国科技创新合作活力最强、频率最高、交流最密切的地区之一。此次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将探索四个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示范区的协同联动、苏浙沪皖四个技术市场的协同、长三角科技创新券的通用通兑机制和科技创新与转化服务资源的开放共享,为长三角服务一体化、政策协同化、交易标准化积累实践经验。

中国创新挑战赛是针对具体技术创新需求,通过“揭榜比拼”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的创新众包服务活动,目前已举办两届。上海市科委创新服务处处长陈宏凯表示,这其实是科技成果转化化的“第二条路”——通过企业需求,倒逼高校、科研院所进行科学创新,就创新速度而言,“第二条路”更快。

去年,上海市科委在首次承办的中国创新挑战赛上征集企业技术创新需求206项,被上海各高校、科研院所“认领”后,最终有104项需求得到精准对接,21项需求得到完善解决,达成了17项技术转移,征集需求100%获得跟踪处理。

据悉,上海每年60%至70%的技术交易成果实际上是流到了江浙地区,不少相当规模的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离不开上海工程师。日前,科学技术部已批复的六个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中,上海闵行、浙江、江苏苏南、宁波四个都在长三角区域,而且这四个示范区各有特色。

借助此次挑战赛,上海将拿出最受关注的国际科技资源,为长三角企业提供面向全球的技术解决方案,据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执行副总裁邹叔君介绍,去年该中心已试点带着200多家上海企业的技术需求出国门,分别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举行对接活动,最终有13个团队完成项目对接。目前上海已经布局的这近30个国际技术转移渠道,将与长三角地区共同对接,实现协同创新联动。

另外,四地还将探索上海国际技术交易市场、浙江科技大市场、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四个技术市场的协同,以及长三角科技创新券的通用通兑机制和科技创新与转化服务资源的开放共享等关键问题,为在太平洋西岸崛起创新高地打下坚实基础。